

甘肃省哲学资料 选 编

(第二集)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室

目 录

关于主观主义	(1)
“驳紧张论”	(6)
驳“在落后地区成立人民公社没有必然性” 的错误观点	(14)
从人民公社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 性质的规律	(21)
生产力论是早已破产的修正主义	(26)
中央对甘肃省委关于批判“甘肃落后论”等右倾 机会主义思想的报告和合作化进展情况的报 告的批示	(38)
甘肃省委第五次全体会议(扩大) 情况简报(第二部分)	(40)

彻底批判“甘肃落后论” 全力开展技术革命

和文化革命 (43)

“甘肃落后论” 必须继续批判 (56)

彻底解放思想大胆进行领导 (69)

我省许多单位讨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

——兰州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举行座谈会

..... (75)

讨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 (77)

怎样认识对立统一规律 (80)

驳余贤杰同志的“一分二合”论 (86)

方以智的“合二而一”是什么货色? (93)

关于主观主义

主观主义的表现是什么？主观主义的表现有两方面，一个是超过客观现实，一个是落后于现实。一个超过，一个不及，这都是违背客观现实的，都叫做主观主义。但是不少人总认为，超过现实就是主观主义，落后于现实就不是主观主义。这样，那些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往往很自然地落后于客观现实。这些人总是墨守成规，因循怠惰。本来客观现实要求他们赶上去，而他们却硬要慢些。他们把超过现实叫做“急躁”，把落后现实却叫做“稳”。过去对干部规定几乎都没有把落后现实因循怠惰定为主观主义的，

右倾保守主义在甘肃是突出的，也是很顽强的，市场是很大的，很不容易克服。从1954年起，我们在三年中一年比一年较积极，两年思想都赶不上。为什么这样，是很值得我们警惕的。就甘肃来说，党内工人出身的人只占百分之零点九，一百个党员中连一个工人出身的都占不到。党内小资产阶级大量存在，占绝对优势。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革资产阶级的命，同样要革小资产阶级的命。经济上改变所有制，农业手工业要集体化，这就是革小资产阶级的命。特别是富裕中农，要变革所有制，他们的心总是要痛的。而且在生活习惯、生产习惯上也要来个很大的改革。这两个改变都很不容易。要改变，就有很多不同的抵触情绪。这和民主革命不同，革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命，是比较容易的。所以在民主革命中有不少人是英雄好汉，现在就变成了“懦夫”。在社会主义

革命中，右倾思想严重是个基本问题，农村大辩论中千千万万事例说明了这个问题，有些人希望最好不要变，但是大势所趋呀，是高潮呀，就不得不跟上走。有的农村干部把骡子拉回家，舍不得入社，要他说合作社好，当然是不可能的。要他对社会主义革命积极，当然是不可能的。他们必然会因循怠惰，必然有右倾思想，根源就在于此。主观主义在甘肃就是这样。

这里，要提出一个老问题，这就是批判“甘肃落后论”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批判，右派分子反对，有右倾思想的人也认为批判是不对的。这个问题，在整改中再很好地辩论一番，是有好处的。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否认甘肃有落后的一面。甘肃原来的经济文化是落后的，正因为落后才革命么！在民主革命后，就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有人认为不能革命。事实证明合作化后，“皇上”就很难出了，就是有人把皇上帽子戴到头上，我们也很容易就打掉它。事物总是要变化，要发展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帮助发展，促进它发展，所以就要办很多事情。但是有右倾思想的人却认为不要办，不要促进，不要革命，或者让它“慢慢来”。所以要批判这个思想。我们有很多社会主义事业，应该办，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原来的工业基础落后，农业落后，文化落后，正是因为落后，就应该加速发展，加速建设，而这种加速发展和建设，完全可以办到。事实证明，只要思想对头了，合作化的速度就快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也快了，其他事业的发展速度也都快了。大学里的右派分子说，把有些系并到外边大学里去，因为甘肃落后。那就是说，不要革命吧，让它永远落后下去吧。右派分子当然希望这样，这是不足为

奇的，问题是有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让他落后下去，不去革命，这就不对，应该批判教育。一定要认识：我们原来的经济文化所以落后，就是那个时候没有社会主义革命。有了社会主义革命，就能够改变落后，逐渐变成先进。

右倾保守思想确实严重，以农业基本建设为例，1956年是比较积极的一年，修了四百三十六万亩水地。去年是大跃进，今年是整顿巩固。省委决定今年修三百万亩地，但各方面强调困难，接受不了，改为一百五十万亩还分配不下去，又改为一百三十五万亩，吵了很长时间才定为一百一十二万亩。这比去年降低了百分之七十四多。这一百一十二万亩应当完成吧，可是到9月才完成一百万亩。好在大放大鸣大辩论，中央又作了关于发展水利的决定，掀起了高潮一鼓劲才完成了这个任务。从这里便可看出右倾保守思想多么严重！对我们事业的危害多么大！林业也一样，去年三百五十万亩，今年二百四十万亩，到9月中旬只完成一百一十万亩。水土保持去年完成一万七千平方公里，今年的任务是一万平方公里，到9月中旬仅完成七千三百六十八平方公里。拿统购统销的物资来说，去年是大丰收，增产粮食二十六亿斤，实际增产数字决不止二十六亿斤，农村大放大鸣大争中说明很多社或多或少的隐瞒了产量的，有的隐瞒产量达到一倍。可是去年的征购任务有七千四百万斤没有完成，而统销上却多卖了一亿三千万斤。在这个期间，地主、富农和有些富裕中农进行投机倒把活动。羊毛和麻的统购也没完成，连公债也没完成。

我们的商业系统也不例外，自由市场开放，商贩大量增加，对他们不加管理。有些小商小贩，实际上是大商大贩，全省年产大麻二千零五十万斤，光黑市走私就达五百万斤。

兰州市有两个地下自行车商店，有一家一天上市三百辆车子而国营商店却脱销得没有一辆车子。有些合作商店积累太少，定西有个合作商店把百分之九十八的利润分掉了，他们每人每月工资平均七、八十元，而全省只平均五、六十元。天水一个饮食行业，从合营到现在两年了，只积累了两角钱。这些人们都不为社会主义，只为资本主义了。现在听起来很好笑，但这样的事例很不少。许多事情并不是不知道，而是严重右倾思想，看不出这些问题，

政法方面，只强调检查轻罪重判，不检查重罪轻判，只检查错捕，不检查漏网的现象很严重。在兰市七里河区的一百六十八个案件中，有罪判无罪者五件，重罪轻判者二十七件。一个强奸犯荆保安，强奸了一个四岁女孩，只劳改一年交机关执行。兰州市释放了八十二个犯人，就有二十九人不该释放，平凉华亭有一个犯名叫陈兴虎，是一个罪恶很大的反革命分子，是老区的一个叛变分子，给敌人当过便衣警察，供给情报，引敌军袭击我们的军队，他自己就打死我们十六人，还烧毁过仓库，1949年逃到青海、陕西，1955年逮捕他时，他还持枪抵抗。象这样的人本应处死刑，但平凉法院因“本人不服”，反复四、五次，拖了两年，至今未处理一个反革命杀了我们三、四百俘虏，现在还未处理，也不向上级作报告。甚至还有人以奇奇怪怪的借口为罪犯开脱。一个流氓强奸幼女，女方父亲当场抓住，扭送法院，法院说没有旁证不予处理。一个流氓强奸了一个哑吧妇女，罪犯也供奸认不讳，但临夏法院说，被害人没有口供，不能法办。强奸要旁证，向哑吧妇女要口供，这是滑天下之大稽。这种错误作法助长了城市刑事案件的增加。今年上半年兰市有一千一

百九十几件，与去年同期四百零一起比较，上升了百分之一百九十六。为什么会发生诸如此类现象呢？因为司法工作人员认为没有阶级斗争了。此外，还因为有些干部骄傲自满，堕落腐化。政法部门老干部多，老当然好，但其中有些人包袱很大，蜕化变质。甚至在这些机关中混入了阶级异己分子。我们专政的武器掌握在这些人手，当然会袒护反革命，当然不是对敌人专政了。

文化教育方面，右倾思想也很严重。本省人民群众，办了许多学校，有小学、有中学，很好。但我们却有没认真总结经验，认真加以提出。当然，发展文化教育不能超过现实，但群众靠自己的力量办学，方向是对的路线，是对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却不愿这么办。在文艺上，不认真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我们的剧团多数集中在城市里，不愿下乡下厂，或很少下乡下厂，给工人农民演剧。对于火热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对于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对于先进的人和事，不去反映，不去描写，却要关住门演大的，演“钉呆迷”，工人和农民怎么会欢迎呢！知识分子要在革命实践和生产劳动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只有懂得了劳动人民的心，才能写出好东西。不经过“汗滴禾下土”，就不知道“粒粒皆辛苦”，就不知道“劳动神圣”的真义。把麦子当成非菜的人，怎么能写出好作品呢？可是、过去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却做得很不够。不是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去锻炼他们，让他们在群众斗争中去经风雨，见世面，而是迁就他们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一本书主义”。这是极端危险的！

右倾思想严重的人，因为对社会主义不是那么热情，所以对问题的看法也不是那么严重了。这样严重的右倾思想，不加克服，如何能组织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如何能有愚公移山的劲头？如何能千方百计去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当然是不能够的。

此文是《必须做好整改工作》一文中的第四部分见《甘肃日报》

1957年11月12日

驳“紧张论”

当前，党正确领导人民群众在粮食战线和钢铁战线上飞跃前进。在这时候，我们听到了一种声音：大跃进过于紧张了，钢铁战线上调的人太多了，农村青壮年走光了，老汉娃娃苦咋了。这种声音我们在1957年曾经听到过，那时高级合作化实现了，就有人大声疾呼，说“农民生活太苦了”。这种论调，遭到了人民群众的痛击。时隔不久，现在人民公社化实现了，全民大办钢铁的运动开展了，又有人在喊了，声音和目的一样，只不过说法不同，角度有别，一个是从生活“苦”上做文章，一个是从劳力“紧张”上做文章。看起来好象都是关心群众，为群众着想，剥开皮来看，却大大不然。

我们认为紧张是存在的，不仅现在存在，以前早就存在。革命就是逼出来的。试问不紧张我们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自由吗？不紧张我们能够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吗？不紧张我们能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把农民从地主的残酷压榨下解放出来吗？不紧张我们能够废除几千年来的私有制度，建设起社会主义制度吗？当然不能。这是革命时期的紧张。在建设时期，仍然存在着紧张。建设时期的紧张来自两个方面：一种紧张是来自生产力的发展；另一种紧张是来自敌人的压力。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里，生产的发展受到种种束

缚，劳动人民受地主和资本家残酷的剥削，终年劳动不得温饱，生产力的发展，自然很低。解放以后生产关系起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所代替，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途。恩格斯曾经说，生产手段一为社会所掌握，社会生产内的无政府状态，就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了，个人的生存斗争停止了。这样，人才第一次——在某种意义上是最后地——脱离了动物界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转到真正的人的生存条件。一切环绕着人并且至今统治着人的生活条件，现在处在人的支配即统治之下了。人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真正的主人翁，因为他们成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的主人翁。……只有从这时候起，人们才开始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这时候，他们所推动的社会原因，才将以极大的和日益增加的程度，给出他们所希望的结果。我们正处在这样的时刻。

旧社会给我们遗留下来的是一穷二白，在我们甘肃则是更穷更白。当人民群众真正成为自己社会关系的主人翁的时候，就要迅速改变这种“穷”“白”状况，过幸福美满的生活。这是人民群众的愿望，是生产力的发展的必然要求。

“苦战三年，改变甘肃面貌”的口号就是党根据人民群众的愿望提出来的。一经提出，就立刻变成了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大干特干，不改变穷白面貌非好汉”！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干劲，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苦战”，这是人民群众迅速改变穷白面貌的革命手段，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苦战”。在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人民群众苦战数十年，才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在建设难道就不需要苦战了

吗？不苦就建设不成社会主义，就改变不了穷白面貌，正如不苦战就不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一样。

“苦战”，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高度共产主义觉悟基础上的奋不顾身的劳动，这种劳动自然是紧张的。由于这种紧张的劳动，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穷白的面貌得到了迅速的改变。干旱的山川到处兴修了水利，几千条小河引上了高山。甘肃在解放前按农业人口计算每人平均水地不足一厘，现在每人平均有水地二亩五分。1949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只三十九亿多斤，现在已达二百亿斤，亩产由一百零一斤提高到四百零五斤每人平均粮食1949仅三百二十斤，现在已达一千五百四十斤，由缺粮省一跃而为余粮省。钢铁生产。在过去完全是空白点，今年在几个月内就可生产三十万吨铁、十万吨钢。全民大办工业以来，工厂到处出现。文化教育的发展，也是空前惊人的，解放以前文盲占人口总数的90%以上，现在全省已基本上消减了文盲，学校林立，诗歌满乡，人民生活大大改善。这样高速度的发展，不能不使人惊奇。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紧张的劳动，干旱面貌能如此迅速的改变吗？没有紧张的劳动，粮食产量能在几年以内翻几番吗？没有紧张的劳动，人民生活过得这样好吗？为着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并且为将来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做，诸如消灭工农差别、消灭城乡差别、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等等，要作到这些，不苦战、不紧张劳动行吗？

因此，我们认为在大跃进中的紧张，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是革命的常规，是国家建设中的正常方法，是天大的好事。这种紧张消灭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失业现象，使人

人有工做，个个有饭吃，使生产高度发展，生活迅速改善。这种紧张也使人心情舒畅，精神愉快。因此，这是一种可喜的紧张。如果不要这样的紧张，就会出现另外一种紧张。大家都还记得1957年马鞍形的教训，那个时候由于右倾保守思想兴风作浪，工农业生产没有多大发展。以兴修水利为例，

“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因为吹来了一股右倾歪风，开始泄了劲，省委起初提出1957年修三百万亩水地的任务分不下去，减到二百万亩也分不下去，一减再减，一直减到一百五十万亩，还是分不下去，最后定为一百三十五万亩但是到了9月底只完成了一百零二万亩。这次整风运动特别是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又把干劲鼓起来了，四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四百多万亩。今年可以超过一千万亩。（张仲良：

“鼓足干劲、苦战三年，为改变甘肃面貌而斗争”）（实际上完成了一千七百万亩。在马鞍形时期不独生产没有多大发展，歪风邪气也曾一度上升，在干部中有闹级别待遇的，在工农群众中也有少数闹事的，地富反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则乘机兴风作浪，一时乌云乱翻。那个时候工作并不怎么紧张，但歪风邪气却紧张起来了。那时候人们的心情是不大舒畅的。经过全民整风运动，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局面才为之一新。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紧张，革命就要使人紧张起来，不紧张还革什么命？疲疲踏踏还能建成社会主义吗？

另外一种紧张是来自敌人的压力。解放以前，人民群众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重压迫，生活极端贫困，生命财产没有保障，正如民歌所描写的：“地里的庄稼上场了，东家的大骡子到了，交过了团课皇粮要，穷哥们没个活路了”。终年劳动的果实被地主们一捞而尽，农

民们只好过“吃饭不见一根面，出门没个裤子穿”的悲惨生活，这才是真正可怕的紧张。人民不安于这种紧张，才逼得起来干革命，推翻了敌人的统治。不如此就不摆脱贫困的威胁和与俱来的可怕紧张。解放以后一直到现在，帝国主义者仍然制造紧张形势，给我们施加压力，这就逼得我们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认真对付。为着对付帝国主义，我们就得加紧建设，就得积极地紧张地劳动，这是敌人逼出来的。只有这样才能粉碎帝国主义造成的紧张形势，击败帝国主义的侵略，问题很明显，不是东西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如果我们不紧张建设，帝国主义就能得心应手，任意宰割我们，那样的紧张局面我们是反对的。

这两种紧张性质是不同的，当前我们所谈的紧张，主要是前一种，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其次才是敌人的压力。前一种紧张对人民绝对有利，后一种紧张对人民不利，是一种坏事，但是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任何革命都是逼出来的，有了后一种紧张，就逼得我们加紧建设，飞跃前进。紧张和不紧张是对立的统一，有紧张，才能有不紧张，现在我们紧张建设，才能改变穷白面貌，才能实现机械化，代替繁重的体力劳动，过幸福美满的生活。只有紧张建设，才能壮大我们的国防力量，取得和平，消除敌人造成的紧张形势。

当然，我们说紧张是革命的常规，并不意味着只要人们苦战而不要休整。如果不休整，一股劲的苦战，那是战不下去的。苦战和休整是对立的统一，没有苦战，就无所谓休整，有了休整才能更好地苦战。在战争时期，两个战役之间有一段时间的休整，就是为了更好地战斗，在大跃进中，党强调有节奏的生产，就是为了高速度的跃进。这充分表现了党对群众

劳动热情的珍惜和对群众生活的关怀。但是，我们和“紧张论”者的争论，并不是在大跃进的前提下，具体的战斗部署上的争论，而是要不要跃进的争论，我们强调在苦战时要注意休整，是为了高速度的前进，这和“紧张论”者要我们下马不进是有原则区别的，一个是促进，一个是促退。“紧张论”者并不关心群众的劳动和生活，他们叫喊紧张的实质，是反对总路线，他们主张一切都慢慢来。组成总路线的任何一个字也不意味着要慢慢来，要鼓足干劲（不是疲沓松懈），要力争上游（不是顺水行舟），要多快好省（不是少慢差费），每一个字都充满着革命的战斗精神，都意味着紧张的劳动。主张慢慢来的促退派是坚决反对高速度的，而“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本来很落后，我们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刘少奇：八大二次会议报告）按照“紧张论”者的方针，一切都慢慢来的话，就达不到这个目的，社会主义就建设不起来。“紧张论”者既然坚决反对总路线，也就坚决反对为着实现总路线而开展的群众运动，因此每当群众运动一起，他们就坐立不安，拚命叫喊。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反掉总路线、反掉群众运动，自然就会反掉他们害怕的那种紧张——革命的常规。因此，“紧张论”者是最没有群众观点的。和“紧张论”者的斗争实质是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

“紧张论”是富裕中农的思想反映，是“甘肃落后论”在新形势下的变种。害怕紧张者多是富裕中农。富裕中农是

农村的资产阶级，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安于丢掉资本主义，在大跃进的形势下不得不随着大流走，一有机会就叫喊。合作化的时候他们叫喊农民生活苦，大跃进中他们叫喊劳力紧张，逼人下马，他们对于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都有抵触情绪，对于全民大炼钢铁也反对。在大跃进中广大农民以共产主义精神夜以继日地劳动，这种劳动紧张而又愉快。但富裕中农却吃不下这种苦，更不愿做没有报酬的劳动。于是他们就以关怀群众的面目出现，叫苦连天。皋兰有个干部，在他领导的地区农业没有搞好，问他为什么，他说劳动力都调到钢铁战线上去了；在他领导的钢铁战线上采矿工作作的也很差，问他为什么，他又说尽是些老汉娃娃，没有好劳动力。他两头叫喊紧张，其目的就是要慢慢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右倾歪风的不时抬头，就是富裕中农在那里作怪。在干部中间有许多人的家庭就是富裕中农成分，富裕中农一兴风作浪，他们就立刻有所反映。因此同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

“紧张论”者是主观主义者。他们反对不断革命，在他们看来一切事物都应该是静止不动的，他们是现状维持派，任何超越现状的东西都是要反对的。他们的世界观是“不动论”。他们不了解，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发展的，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的，“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这就是不断革命的根据。没有矛盾社会就不会发展，在大跃进中的紧张现象，就是矛盾迅速发生变化的表现。被私有制束缚的生产力一被解放，就以飞快的速度向前发展，由于生产力迅速发展就引起了一系列的矛盾，发展越快矛盾就越多，这些矛盾都

需要在短时期内迅速解决，不迅速解决就会妨碍发展。这就需要紧张的劳动和工作，不紧张，矛盾就解决不了，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紧张论”者想“慢慢来”是办不到的。因为他们的想法是和事物发展的规律背道而驰的。要不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就要不断革命，不断前进。在当前就要彻底批判那些各式各样的非难紧张的“紧张论”者，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彻底解除他们的武装，扫除大跃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让生产力更快地发展，让社会主义早日建成，让共产主义很快地到来。

——原载《红星》1958年第五期

驳“在落后地区成立 人民公社没有必然性” 的错误观点

有人说：“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先进地区，成立人民公社有它的必然性，而在落后地区成立人民公社就没有必然性”。这是通过否定局部来否定全体，否定“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的正确论断。从思想实质上，与右倾机会主义者叫嚣义的“搞早了”是一样的。但是前一说法比后一说法多了一层“理论”的伪装——即“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作为“依据”，因此，就更容易迷惑人，危害性也就更大。为了澄清思想，深刻认识“人民公社是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合乎规律的产物”，就有必要对上述错误观点进行剖析：

1、什么叫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当前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是否不平衡？是怎样一种性质的不平衡？

2、如何理解人民公社生产的必然性？落后地区具备不具备这种必然性？

首先谈第一个问题。

学过政治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一些部门、地区发展的很快，另一些部门，地区发展得很慢，甚至倒退，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是竞争和生产无政，